

### 第三章 东南亚部分铁器时代遗址珠饰实地调查

#### 二、缅甸古代石质珠饰野外调查

虽然经过了 40 年的发掘和研究，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对缅甸中部铜-铁器时代文化和遗存的认知依然十分有限，已有的发掘和研究都集中在曼德勒南面的萨蒙河谷地区。萨蒙河谷文化(Samon Valley Culture)出土器物包括器型典型的陶器、铜器和祭祀用品，铁质工具和武器，以及数量和材质种类都非常丰富的珠饰、环与镯等装饰品。其中，一些石环呈椭圆形、近方形钝边三角形，这些式样的石环与下钦底威(Chindwin)地区铜器时代墓葬所见器物有联系，萨蒙地区发现的圆形、扁圆形的石(玉)以及玻璃环与周边地区(如泰国)的同期墓葬类似(图 3-6)。萨蒙河谷地区似乎是该时期珠饰制作的中心，特别是红玉髓珠饰，红玉髓质地的虎形饰在多个地区的遗址被发现而广受瞩目。<sup>[1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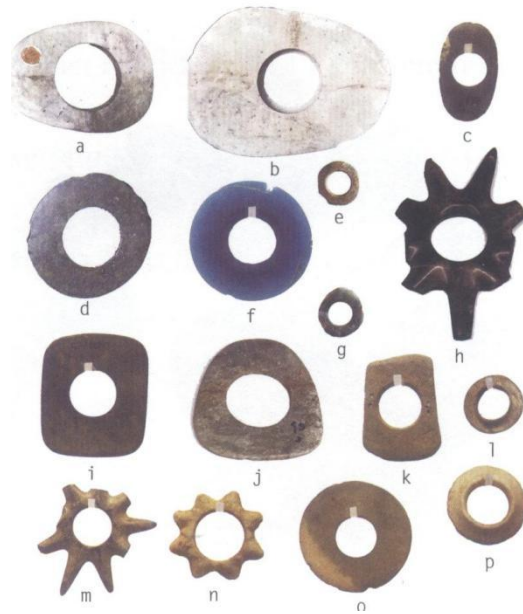


图 3-6 缅甸中部、北部出土的铜器时代晚期的石(玉)环(a-e、g-p)与蓝色玻璃大环(f)

珠饰制作使用的材质丰富，从陶到各种半宝石，乃至贵金属都有发现。根据当地珠饰挖掘者叙述，早期的墓葬多使用石英岩石质制作珠饰，特别是绿玉髓及用其制作的大象形珠饰非常典型常见，稍晚时期的墓葬中红玉髓更多。根据对几个在标贝附近发掘的典型墓葬研究后认为，红玉髓制作的珠饰大量出现在公元前 500 年至公元前 400 年之间的遗存。如在 Ywa-din-gon 的遗址涵盖了早期和晚期的遗存，其中早期的遗存出土有少量玛瑙和石英质珠饰，同时出土有一定数量的铜器和大量陶器；而晚期的遗存则多见红玉髓饰品和铁器。萨蒙河谷文化的墓葬中陪葬品的分布并不均匀，如在 Hnaw Kan 的遗址中仅有一小部分墓葬出土数量丰富的珠饰随葬品，这暗示了当时的社会出现了贫富的分化，而且红玉髓的来源是有限的，有学者推测是从印度传入。<sup>[13]</sup>

关于萨蒙河谷文化，根据目前发现的可靠证据，该文化的遗存主要分布在曼德勒南部标贝(Pyawbwe)地区萨蒙河谷一带，时代介于公元前500年至200年之间。该文化北至哈林的Pyinmana，西距蒲甘山(Popa)的Son Gon，东至掸邦Myaukme gon，几乎涵盖了整个缅甸中部平原干旱地带。萨蒙河谷文化遗存中基本没有婆罗门教或佛教元素的痕迹，出土的青铜器与云南滇文化有紧密联系。<sup>[14]</sup>萨蒙河谷文化遗存中亦有发现铁器，如Hnaw Kan出土有少量铁质兵器和其他铁器。该文化遗存以出土铜质棺木装饰片、铜针束、铜镯、铜柄铁剑、具纹饰铜矛头、蓝色玻璃大环、红玉髓虎形珠、蚀刻珠等为特色<sup>[15-17]</sup>，其中珠饰材质丰富、数量巨大。

铁器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即在缅甸出现<sup>[18]</sup>，这些铁器主要作为生产工具和武器而促进了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铜器在该时期多作为陈设品而存在，根据陶器中残留的稻作物痕迹推测，该时期的农业已有较大发展，彼时对周边地域的拓展、贸易线路的控制以及和矿产自然资源的进一步开发使得社会出现阶级分化，如缅-法考古项目发掘了位于Ywahtinkon的一座墓葬，其陪葬品丰富程度与周围墓葬形成了强烈的差别。使用印度原料和技术制作的红玉髓珠饰的出现被认为是该地在公元前500年前后社会发生分化的标志，与泰国中部诺乌罗一系列铁器时代遗址所展现的情况相似，珠饰以其可视的符号性及稀有性成为显示个人社会地位和财富的标志而被聚落中的上层阶级所占有。萨蒙河谷文化中有一类特殊的形制巨大(可至10 cm左右)的红玉髓“虎形”坠饰，该种坠饰广泛发现于萨蒙河谷地区<sup>[19]</sup>，甚至在泰国中部湄南河平原的班东达潘亦有发现<sup>[20,21]</sup>。玻璃珠饰和玻璃环在萨蒙河谷型墓葬中常见，一些玻璃环直径可达25cm左右。<sup>[22]</sup>相对于更早期Nyaunggan发现的珠饰来说，萨蒙河谷地区的珠饰制作更精良，材质也更丰富。

### (一) 莫哈拉(Myo Hla)遗址

莫哈拉遗址位于亚美提(Yamethin)镇西南方15 km左右，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地村民就在莫哈拉遗址挖掘古代珠饰出售。该遗址是萨蒙河谷文化遗存在缅甸中部平原南缘的代表，2004年法国考古队对该地5个点位进行了正式发掘，其中1号和2号点位位于Myo Hla村内，3号、4号点位位于村外西北侧，5号点位已遭非法盗掘破坏。其所揭露文化层年代白新石器时代至近代。<sup>[23]</sup>

1号点位：共发现30多个墓葬，有空心木棺、裹席葬和瓮葬3种入殓方式。其中20个墓葬中残留有遗骨，此地亦见有孩童墓葬和家庭墓葬。该墓葬群中仅有10个墓葬发现有红玉髓、骨质和玻璃质珠饰，另外有3个墓葬中的遗体右下臂穿戴有象牙质手环。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具遗体双臂发现佩戴象牙臂环，手腕佩戴有玻璃大环以及红玉髓珠饰；头侧放置有浅陶碗，脚端置有圆底陶瓶，亦发现有圆筒状铜罐残片。丰富的陪葬品显示该墓主可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该遗址同时发现有数量丰富的铁器，如铁斧、剑和刀等。

2号点位：仅进行了初步发掘，其中两具遗骨左臂佩戴有象牙质手镯以及至少有5个红玉髓珠组成的手钏。同时，见有铜器碎片和典型萨蒙型陶器。

## （二）哈林（Halin 或 Hanlin）遗址

哈林遗址位于缅甸中部平原的北端，南部距离曼德勒约 120 km，该地区是缅甸重要的考古遗址，保存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骠时期完整的文化地层序列（图 3-7）。哈林遗址的零星考古勘察始于 1905 年，正式而系统的考古发掘由缅甸学者 U Myint Aung 和 U Sein Maung Oo 于 1962~1967 年开展，共发掘各个时期遗址 19 个（HL-1 至 HL-19），发掘对象有居住遗址、墓葬、宗教建筑和城市防御建筑等。1995 年仰光大学考古系的学生在 U Myint Aung 的指导下对哈林 20 号遗址（墓葬）进行了发掘。<sup>[24]</sup>1998~1999 年，哈林 21 号（HL-21）到 24 号（HL-24）遗址在 U Paing Soe 的监督下发掘，发现有军事防御、宗教建筑和居住遗址。2005~2006 年，U Kyaw Kyaw 发掘了哈林 25 号和 26 号遗址，该遗址完整保存了从铜器时代到骠时期的墓葬并有丰富的文物出土。2008~2011 年，U Myat Swe 对哈林 27 号到 30 号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有防御围墙和墓葬。哈林 31 号到 33 号遗址为骠时期的城门遗址，由 U Myint Soe Aung 于 2011~2012 年清理。2013~2015 年，缅甸考古学者继续发掘了哈林 34~38 号遗址。<sup>[2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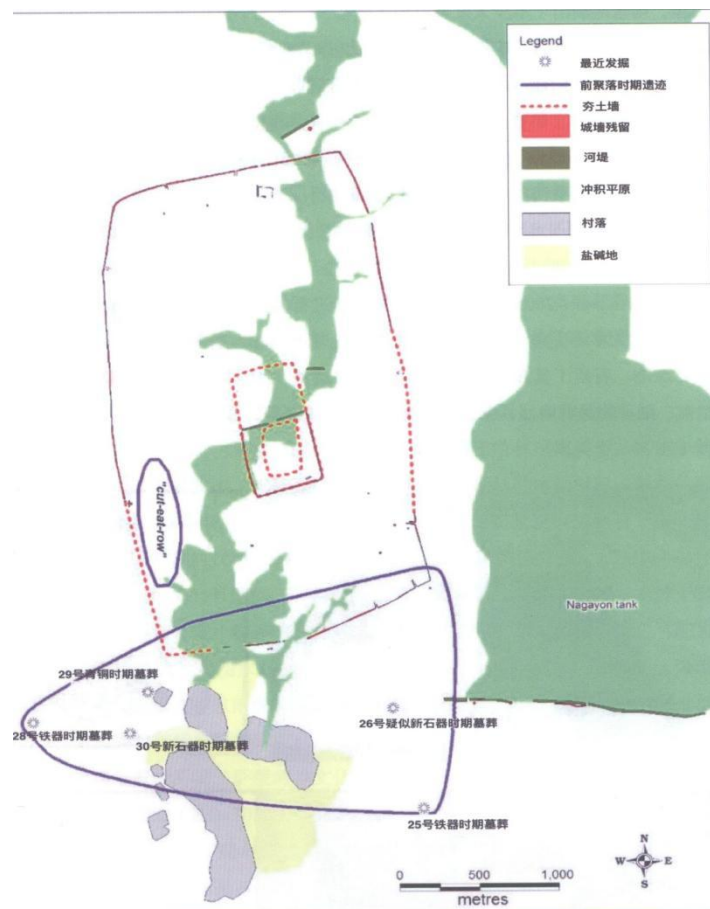


图 3-7 哈林古城及遗址分布简图<sup>[26]</sup>

总的来说，哈林地面可见遗址基本上都属于“骠国”时期，碳同位素数据分析认为，骠文化存续于公元60~870年之间<sup>[27]</sup>，墓葬形式以火葬为主。铁器时代早期遗址主要是墓葬和骠文化遗存叠压之下的居住遗址，且多分布于哈林骠文化古城南城墙之外，多为土葬，遗骨周围多发现有丰富的随葬品。

2001年，雨水冲刷出了不少未发掘过的土葬墓，Hudson于当年对这些墓葬进行了走访<sup>[28]</sup>，这些墓葬遗址中出土有磨制石斧和石环、玉环、铜斧、铜臂钏等。有一些遗体的手臂上发现戴有石环和铜环。当地乡民向Hudson透露，他们发现有铜和铁质的矛头、箭头以及短剑等武器，其中一些短剑以铁制剑刃、以铜制柄。一些遗体的头骨其齿覆盖金箔（或许是中国古代文化中记载的金齿蛮）。另外，遗体上或周围还发现有一些珠饰，其中一件长约10cm、口中叨含小兽造型的红玉髓制典型萨蒙河谷型虎形饰格外引人注目。

哈林25号和26号遗址由于完整保存了自铜器时代到骠时期的一系列墓葬而具有格外重要的考古意义（图3-8）。哈林25号遗址（HL-25）位于哈林古城南，靠近Shwe-Gu-Gyi佛塔的私人土地，U Kyaw Kywa于2005年组织考古人员对其进行发掘。该遗址属于墓葬遗址，共发现有11具人类遗骸，大多不完整，且由于处于高盐度土壤环境中，骨骼已部分石化；随葬器物有陶器、半宝石珠饰、石质工具和铁质武器。哈林26号遗址（HL-26）位于25号遗址北面，发现有8具人类遗骸，随葬物品有陶器、半宝石珠饰和石环、玉环等，亦有铜器和铁器等金属制品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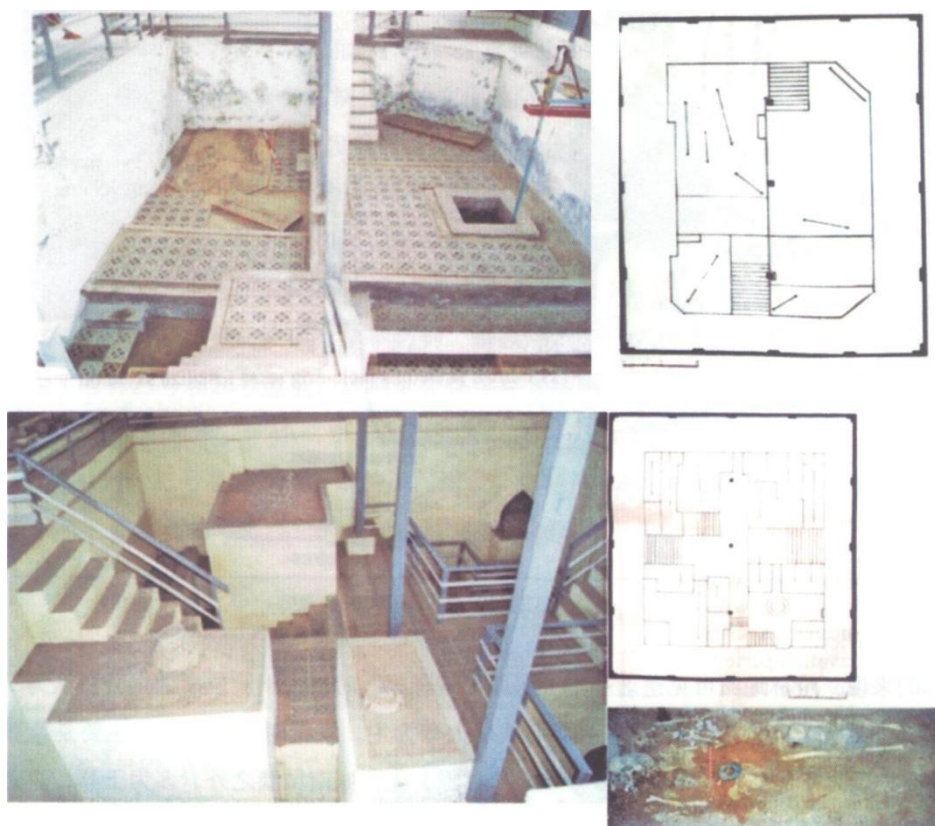


图3-8 哈林25号、26号遗址挖掘现场(图片引自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National Museum1, 2015)

这两处遗址自下而上可分为5个文化层：

第一层：骠文化—现代。距现代地表约0.4 m，为灰色细粒松土层，出土碎骨片和大量有机质堆积物，年限方面属骠时期到现代的农业表土层，堆积物中见有少量残破的陶器。

第二层：铁器时代晚期。距离地表0.5~1.7 m，灰色中细粒沙质土壤，含有石灰质结核。墓葬出土浅口扁平陶器及圆底陶器，出土有少量以红玉髓为主的半宝石珠饰。

第三层：铜铁过渡时代。距地表1.8~3.2 m，棕色中细粒紧土，含有石灰质结核。发现有青铜时代生活遗址和铁器时代墓葬遗址，出土萨蒙河谷型陶器和半宝石珠饰。

第四层：铜器时代。距地表3.3~4.1 m，棕色具红斑块状紧土，含有石灰质结核。青铜时代生活和墓葬遗址，出土磨光石斧、石环、玉环、钦底威(Chidiwi)型陶器等。

第五层：新石器时代。距地表4.2~4.47 m，深棕色块状紧土，含有石灰质结核。新石器时代墓葬遗址，出土有磨制石器。

Hudson 于2009 年对哈林29号(HL-29) 遗址进行了精细发掘，在距地表1.4~2.4 m 的地层中发现有43具人类遗骸，头向朝北稍偏西，他认为该墓葬属于哈林早期类型，区别于铁器时代墓葬中遗体头向朝东的埋葬方式。该墓葬群中至少有一个可确认的木制棺材，但相关的碳同位素数据还未报道(图3-9)。该地出土有铜斧、铜矛、石质珠以及至少30个石(玉)环。一般认为此类石(玉)环为铜器时代的典型器物，中国和泰国亦有类似分布。<sup>[29]</sup> Hudson 仔细清理并记录了哈林29号遗址中的45号遗骸，其双臂穿戴有多枚骨质(或象牙)镯，右臂上另有一铜镯于手腕处；胸前散落有贝壳片珠和暗红色质地可能为红玉髓的细桶状珠、绿色可能为绿泥石的长橄榄状珠和短橄榄状半透明水晶珠。遗骸周围另见铜矛头和铜斧。Hudson 认为该时期的红色石质珠所使用的材质并非东南亚常见的贸易自印度的红玉髓，而可能是源自本地的一种材料，且该种材料的使用年代应早于印度红玉髓。<sup>[30]</sup> 从出土器物来看，哈林29号遗址与较典型的萨蒙河谷文化遗址有所不同，萨蒙河谷文化遗址较少出土大型的石质(或玉制)臂环，且大量使用典型的红玉髓珠饰(图3-10至图3-12)。

笔者于2017年12月参访了哈林考古遗址博物馆和哈林25号、26号遗址，并访问了当地珠饰挖掘者和收藏家。据当地挖掘者介绍，2001年出土有红玉髓虎形饰的地点位于哈林古城南约800 m处的朝阳山坡上，距离哈林25号遗址不远，所出土遗物描述与Hudson 的走访记录基本相同。乡民介绍，当时这些墓葬是被大雨冲刷出来的，但参考附近的一些未被冲倒的树木来看，墓葬的深度距地表1.5~2 m，可能与哈林25号、26号遗址的第三文化层近似，属于典型的萨蒙河谷文化遗存，从出土器物来看其年代可能较哈林29号遗址略晚。

仅供阅读 请勿侵权



a



b

图 3-9 哈林 29 号遗址挖掘现场(图片引自 Bob Hudson, 2015)



图 3-10 哈林 29 号遗址人类遗骸和陶器的埋葬关系 (图片来自 Terence Tan)



图 3-11 哈林 29 号遗址出土的石环装饰品（图片来自 Terence T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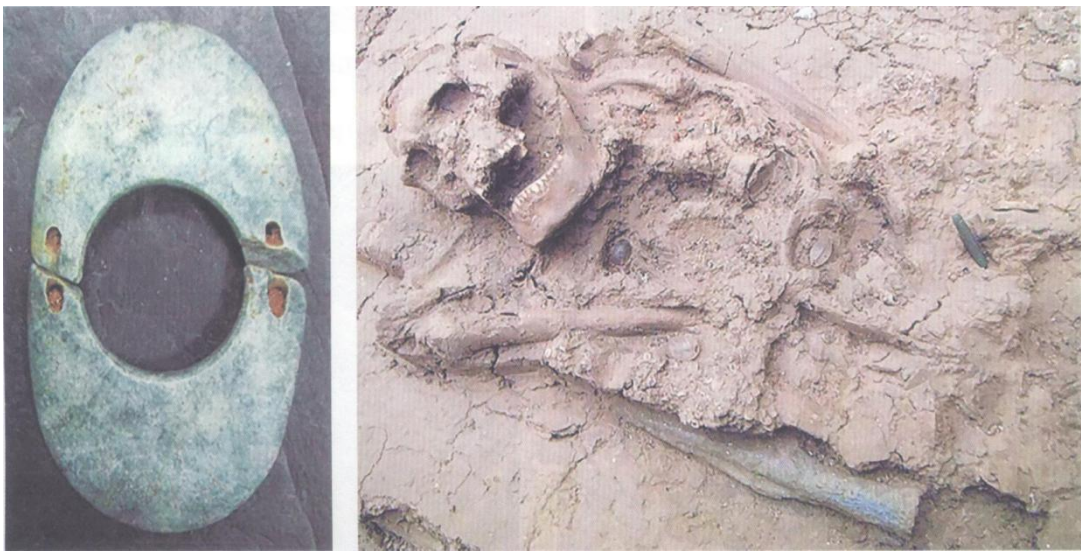


图 3-12 哈林出土的石环装饰物（左图）和哈林 29 号遗址人类遗骸以及珠饰、青铜器的埋葬关系（右图）  
（图片来自 Terence Tan）

### （三）鸣乌列村(Ming Oo Leh)遗址

笔者于 2017 年 12 月实地考察了位于蒲甘东面 63 km 的鸣乌列村墓葬遗址。该遗址由缅甸考古部门发掘，被认为属于青铜时期。共清理出人类遗骸 14 具，其头向大部分朝北，埋葬较浅，最浅的一具距地面仅 0.8 m。此地出土有萨蒙河谷型陶器及青铜柳叶形短剑、铜铃、棺槨青铜装饰以及珠饰（图 3-13、图 3-14）。所出土的红色硬石类珠饰与哈林 29 号遗址的类似，有红色细长圆筒形珠饰、绿色长橄榄形珠饰以及贝壳片珠饰。笔者仔细观察了这种红色细长圆筒形珠饰，发现其质地与东南亚常见的红玉髓珠饰确有不同，其质地更加干涩粗糙，而绿色珠饰可能由绿玉髓制成。根据当地村民叙述，该地还曾出土过绿色石质大象形吊坠以及绿色石质鸟形吊坠等特殊珠饰。



图 3-13 鸣乌列村墓葬遗址的部分出土物（笔者摄于缅甸）



图 3-14 鸣乌列村墓葬遗址（笔者摄于缅甸）

#### （四）瓦蒂(Wadee)遗址

缅甸国家博物馆和考古部门于 2008~2009 年对缅甸中部 Myingyan 区 Phayagyi 村附近的瓦蒂古城进行了发掘。该地出土的长筒形陶器、浅陶碗和圆底陶瓶，与缅甸中部平原分布的萨蒙河谷型铜-铁器遗存出土的器物相似。瓦蒂遗址亦出土有一定数量的萨蒙河谷型硬石类珠饰，U Myo Nyunt Aung 认为瓦蒂古城比典型的骠文化古城要早，应属在铜铁过渡时代萨蒙河谷型旧有城址上，存续到骠国时期的典型代表。

在瓦蒂遗址收集的硬石珠饰是 2008 年第一次发掘时在地表捡拾的，同时发现可能是珠饰抛光用的磨石（图 3-15）；2009 年在探槽 TP-4 内 S-4 号土葬墓遗骸上发现有绿色玻璃珠和残破的红玉髓珠，并有铁器发现，遗骸头向朝东，埋葬深度距离地表仅 52.5 cm。Ko Myo 对比了缅甸中部其他地区的铁器时代墓葬后认为，瓦蒂遗址探槽 TP-4 的人类遗骸是一处铁器时代的墓葬遗存。<sup>[31]</sup>



图 3-15 Wadee 遗址所出土的珠饰和珠饰抛光磨石<sup>[32]</sup>



## (五) 东塔曼(Taungthaman)遗址

缅甸最早的铁器时代遗址是位于安玛拉普拉(Amarapura)附近的东塔曼遗址。该遗址位于伊洛瓦底江东侧的冲积坡上,高出江面约3m。1960年前后,由于该遗址受到自然剥蚀后露出地表,系统的考古发掘于1970年展开。该遗址出土有铁质鱼钩、铁质刀刃和短剑,以及几个铁质油灯。除了铁器的发现,该遗址还出土有几枚黑色蚀刻球形珠(图3-16),相似的珠饰亦发现于泰国班东达潘、菲律宾Icave洞穴遗址中。Stargardt根据出土器物和碳同位素数据认为该遗址与泰国班东达潘年代相似,即公元前4世纪左右。<sup>[33]</sup>



图3-16 在东塔曼遗址出土的黑色蚀刻珠饰<sup>[34]</sup>

Hudson根据正式考古发掘以及民间私人挖掘结果总结了缅甸红玉髓质珠饰的出土分布概况。红玉髓质珠饰主要分布于缅甸中部平原内,其中萨蒙河谷地区格外集中。在工艺的进步和原材料贸易逐渐成熟的影响下,该时期的红玉髓珠饰的数量显著增加。<sup>[35]</sup>到目前为止,缅甸中部发现的萨蒙河谷文化珠饰大多收藏在私人手中,正式的考古记录较少。

标贝(Pyawbwe)附近发现的古代珠饰尤为丰富。该地的古代珠饰挖掘始于1990年,一个居住在Ywahtinkon村的居民在标贝附近一所新学校的地基建设中发现一些古代珠饰,后被曼德勒的古董商高价收购,随即在当地兴起“古珠热”(Bead Fever)并持续至今,导致绝大部分具有重要考古价值的遗址都悉数被破坏。根据当地古珠挖掘者的叙述,硬石类珠饰如红玉髓、水晶、紫水晶、绿玉髓、玛瑙和蚀刻珠等珠饰往往与陶器、铁质工具与武器、玻璃珠等一同出土,在缅甸此类珠饰一般被称为“骠珠”(Pyu bead),但事实上出土珠饰的遗存可能比所谓的“骠文化”要早很多。

蚀刻红玉髓和玛瑙珠曾大量出现于印度西部的哈拉帕时期遗址,公元前500年以后才在东南亚大量出现。<sup>[36,37]</sup> Hudson认为,东南亚(特别是缅甸)地区出土的红玉髓、玛瑙以及蚀刻珠是印度产品和文化输入的证据,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暗示,缅甸在铁器时期亦应是一个重要的制作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在缅甸至少有5个村落叫作“Padigon”或“Ban Di Gon”,即缅甸语“珠子山”的转音。标贝附近的“珠子山”村发现有大量珠饰半成品,距离标贝西南70 km左右的Myo Hla也发现有玻璃珠的半成品。

## (六) 班迪贡(Ban Di Gon)遗址

距离Myo Hla东南6 km左右有一个叫班迪贡的村子,该地曾出土了大量质量上乘的硬石类珠饰,由于长期遭到盗掘,有效的考古证据基本被破坏(图3-17),村民偶尔也会

将发现的珠饰作为装饰品自己佩戴（图 3-18）。根据当地村民叙述，以及 Hudson 在当地田野调查的结果<sup>[38]</sup>，通常第一层墓葬陪葬品很少，当地人称为“穷人层”，该层仅见有一些锈蚀严重的铁器和陶器，在“穷人层”之下一般会有“富人层”。“富人层”的陪葬品丰富，出土有大量的红玉髓珠饰和蚀刻珠，而如果再往下挖，则可能会有另外一个陪葬品稀少的“穷人层”，出土有软质石珠（现经拉曼光谱测试为绿泥石）和铜器。



图 3-17 班迪贡村铁器时代遗址被盗掘



图 3-18 当地村民习惯佩戴在自己田地中出土的珠饰

该遗址最下一层的遗骸头向与上层遗骸的头向的交角大约  $90^\circ$ ，大多朝向北偏东北，最底部的“穷人层”遗骸上发现有很多直径为 1~2 mm 的贝壳薄片珠、绿色长橄榄形珠以及绿色软石珠，另外有锈蚀严重的铜器。根据村民的描述和所见器物的底部分析，“穷人层”可能属于铜器时代，与哈林 29 号遗址以及 Ming Oo Leh 村青铜时代遗址相当。据当地村民叙述，如果挖到遗体上有白色贝壳珠的遗骸一般就停止挖掘，根据他们的经验，再往下的墓葬不会出土贵重的珠饰。被盗掘的出土硬石类珠饰的遗址有 30 多处，墓葬距离地表 2~4 m，遗体头向多向东偏北，与缅甸中部其他铁器时代墓葬遗骸头向相同。据村民叙述，发现的遗骸是“一具压着一具”，遗骸周围往往陪葬有陶器、铁质武器、青铜铃和

其他青铜器等，有的遗骸胸腔部位会放置一个浅口陶碗（图 3-19）。



图 3-19 班迪贡村铁器时代遗址盗掘出土的陶器和铁剑

该地出土的珠饰总体来讲制作精美，形制特殊。以红玉髓制作的珠饰，约占出土珠饰的七成，一些外观呈黑色的蚀刻珠使用深色玉髓制作（图 3-20），当地人称之为“Mahoya”（玛虎呀）。<sup>[39]</sup>水晶、紫水晶较少，蓝色玻璃珠常见，另见有深蓝色、蓝色的玻璃环或镯，大者直径在 15 cm 以上。该地出土大量红色和黑色玉髓质地的蚀刻珠，其中一种红玉髓珠体上蚀刻黑色和白色线条的三色蚀刻珠尤为奇特，该种蚀刻珠在滇文化中亦有发现，故其年代不会晚于西汉。该地亦出土有红玉髓质地的虎形饰和龟形饰（图 3-21），发现这两种动物形的红玉髓珠饰的遗骸周围往往会随葬有数量较多的铁质兵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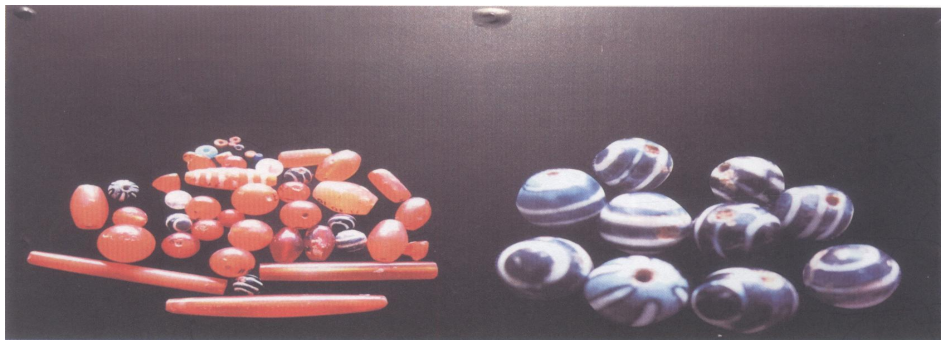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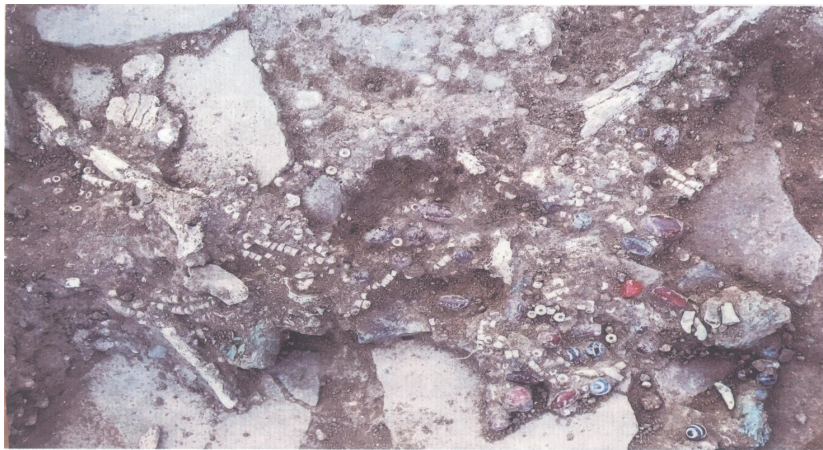


图 3-20 Nanyan gon 出土的珠饰[图片由刘琦翻拍自缅甸国家博物馆（内比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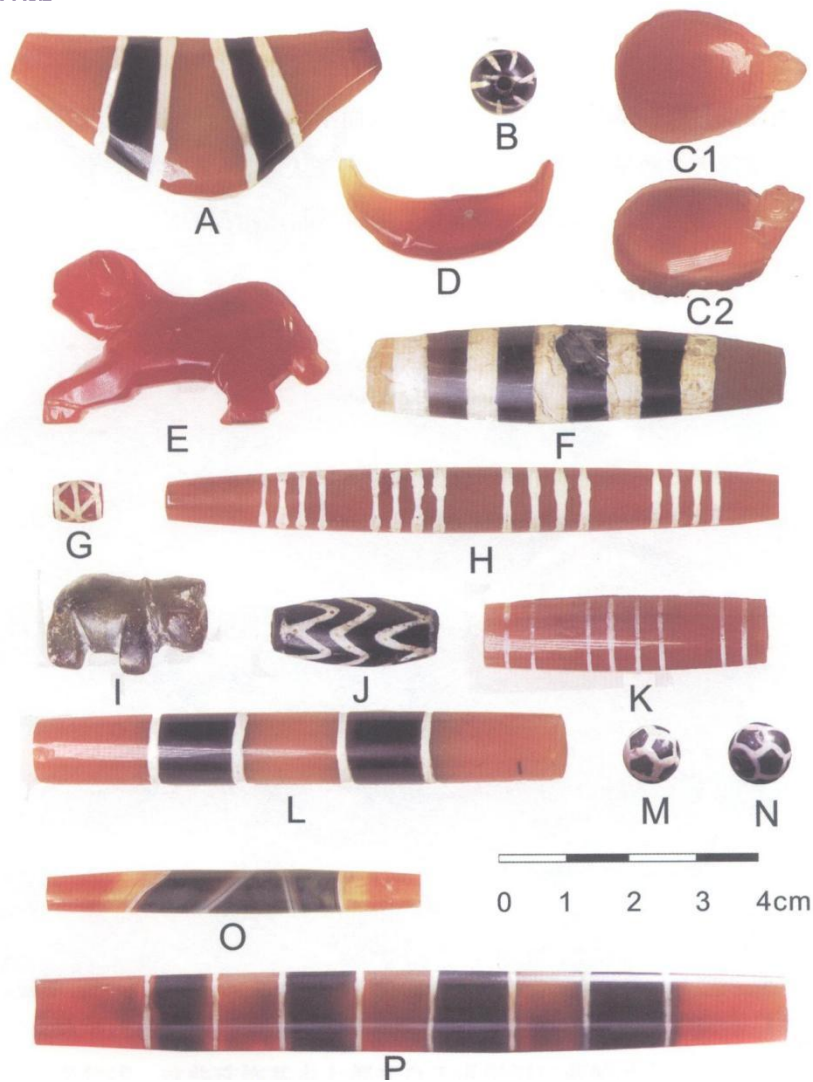


图 3-21 东墩支私人收藏的萨蒙河谷文化珠饰

- A. 水蛭形三色蚀刻玉髓 B. “六线”黑色木化石蚀刻圆珠 C1、C2. 红玉髓龟形饰 D. 月牙形红玉髓坠饰  
 E. 虎形红玉髓饰 F. 长橄榄形三色蚀刻玉髓珠 G. 对连续三角纹饰红玉髓蚀刻珠  
 H. 四组十六线环纹蚀刻红玉髓长管珠 I. 绿玉髓(?)兽形佩 J. 连续折线黑色玉髓蚀刻珠  
 K. 三组八线环纹蚀刻红玉髓管珠 L. 三色蚀刻红玉髓长管珠 M-N. 足球形黑色玉髓蚀刻珠  
 O. 蚀刻三色玛瑙长管珠 P. 三色蚀刻红玉髓长管珠

除 F 与 P 外，当地收藏者称这些珠饰来自 Ban Oi Gon 村。其中，P 来自标贝南部某处，F 的来源不清楚，可能来自曼德勒北方。H 珠可见白色蚀刻环纹共 4 组，每组由 4 条环纹组成，与此相似 K 珠有 3 组环纹，中段有 4 条环纹，两端 2 组各 2 条。C 珠为龟形饰，抛光精美，造型立体写实，四肢刻画较短，该种形制为缅甸所特有。E 珠为虎形红玉髓饰，抛光精美，尾部残缺，虎呈跳跃状，类似珠饰在泰国班东达潘亦有发现，并以缅甸中部萨蒙河谷附近最为集中。G、J 珠亦见于印度北部<sup>[40,41]</sup>。M 珠为玉髓质地，相同质地与纹饰的圆形珠饰亦见于孟加拉北部，印度北，泰国中部、南部，越南中部，以及中国广西贵港汉墓

值得注意的是，缅甸有一种用当地所出产硅化木制作的蚀刻珠。Chambell、Glover Bellina 等学者都曾注意到这种珠饰，这类珠饰使用缅甸中部常见的新生代硅质木化石(图 3-22)<sup>[42]</sup>为材料蚀刻线条而成，有一部分选料粗糙且蚀刻浅而不均匀，所使用材质中明显可见到硅化保存的木质纤维。缅甸大多数博物馆都收藏有该类珠饰并认为其是骠时期产物，

但根据当地村民和珠饰收藏者叙述，出土“高级珠饰”的墓葬里极少见制作粗糙的木化石蚀刻珠。



图 3-22 缅甸中部平原常见的硅质木化石

### (七) 钩墩(Juun Dow)遗址

根据当地古珠收藏者的叙述，在距东墩枝（Taungdwingyi）东面约 30 km 的伊洛瓦底江上有一个叫钩墩的村子，该村是江面上的一个江心洲。该地发现大量的木化石质蚀刻珠半成品和残次品（图 3-23），有的珠子蚀刻好但是没有打孔，有的打孔至一半因珠体破裂而放弃，有的则蚀刻失败。据一个珠饰挖掘者叙述，该地地表可见一些大块的砂岩，其表面有若干沟槽和小孔，因此认为这些砂岩当时是用来给珠饰造型和抛光用的砥石，而小孔则是钻孔的时候不慎打在砥石上的痕迹。很遗憾，由于交通原因，笔者没能到该遗址查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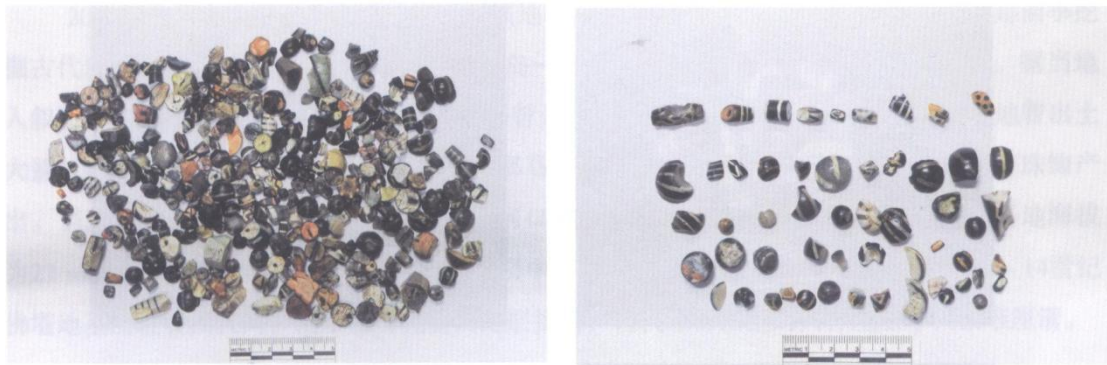


图 3-23 在钩墩收集的木化石质蚀刻珠半成品和残次品

在东墩枝我们看到一批来自此地的珠饰标本。其中，木化石质地的珠饰占八成左右，

其中相当一部分质地粗糙，肉眼即可见硅化保存的植物纤维，且蚀刻深浅不一；红玉髓和水晶较少，且红玉髓蚀刻珠个体较小，没有见到标贝附近发现的深色“Mahoya”质地的蚀刻珠。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标本中有少量马赛克玻璃珠碎片，经过对比，发现这些马赛克玻璃珠与泰国南部克拉地峡甲米府所出马赛克珠饰相同，泰国湄南河平原乌通遗址<sup>[43]</sup>、越南俄厄<sup>[44]</sup>亦见有相同的珠饰。一般认为，此类珠饰年代为3世纪以后的产物，虽然缺乏明确的出土记录，但是笔者推测大量使用木化石制作珠饰的年代应晚于3世纪。

### （八）毛淡棉遗址

位于下缅甸地区的达通(Thaton)城历史上曾是重要的孟人城邦。达通南方约10 km的毛淡棉出土有大量珠饰，该地区尚未进行系统的考古发掘，目前所见珠饰都来自于私人收藏。根据当地古珠收藏者叙述，这些珠饰基本上都来自于近岸河口两侧的台地上，珠子出土相当零散且未见有明确的墓葬，这种情况与泰国南部的三乔山遗址的相似<sup>[45-47]</sup>，毛淡棉可能是一个古港口遗址。据称，高等级的萨蒙河谷型珠饰亦在本地有发现，但皆非出自墓葬。当地所出土的珠饰具有浓厚的海上丝绸之路特色(图3-24)，与萨蒙河谷地区的形制差别明显，如该地所出的双锥截尖多楞珠常见于泰国 Khao Sek 遗址<sup>[48, 49]</sup>和柬埔寨 Phue Sam 遗址，越南中部沙莹文化和中国华南汉代墓葬中亦多见该种珠饰；该地蚀刻珠较少，仅见有一些短小的平行条纹蚀刻红玉髓，相似珠饰可见于印度南部、越南中部沙莹文化<sup>[50, 51]</sup>和中国华南汉代墓葬<sup>[52, 53]</sup>。玛瑙珠饰制作与抛光粗糙，可能是东南亚硬石珠饰第二制作阶段的产物。<sup>[54]</sup>马赛克玻璃珠常见于泰国南部甲米府以及中国华南东汉以后的某些墓葬。



a



b



c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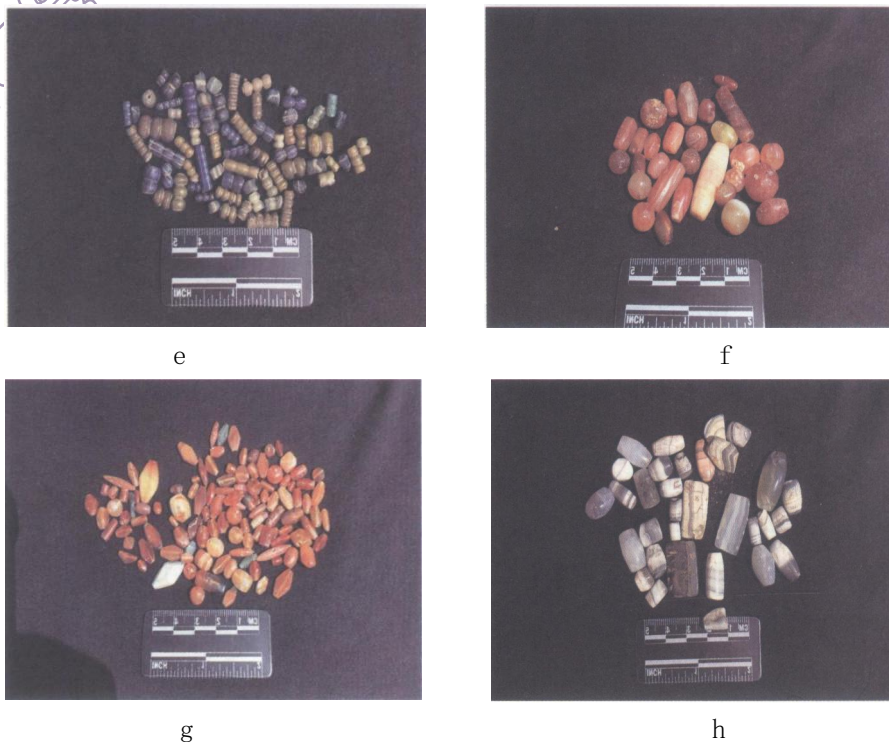


图 3-24 毛淡棉遗址出土的珠饰

- a. 缟纹玛瑙珠饰
- b. 各种形制的水晶珠饰，相似的珠饰亦见于孟加拉湾沿岸、泰国南部克拉地峡等地
- c. 玛瑙珠饰
- d. 红玉髓珠饰，相似的珠饰广泛见于东南亚地区、中国华南等地
- e. 拉制玻璃具条纹珠饰，相似珠饰见于泰国南部克拉地峡及中国广东、长沙晋墓等地
- f. 红玉髓珠饰，相似的珠饰广泛见于泰国南部、越南南部以及中国广东、广西、湖南等地汉墓
- g. 拉制玻璃珠饰及玛瑙珠饰
- h. 扁片状玛瑙珠饰，相似的珠饰见于泰国南部、暹罗湾北侧等铁器时代遗址



图 3-25 怒江河口处古代珠饰出土地点

2018 年，笔者专程到毛淡棉地区考察该地的古代珠饰出土情况。在当地，有村民趁雨季挖掘古代珠饰售卖维持生计，他们在 Bilugyun 岛—怒江河口一线 的河滩高地上挖掘珠饰。据当地人叙述，毛淡棉市西北面怒江对岸的八都马曾是出土古代珠饰的主要地区，10

年前该地曾出土大量的红玉髓以及黄金珠饰，现在对岸八都马的古代遗址基本均遭到破坏，已经没有珠饰产出。当地人转而主要在毛淡棉市西南怒江河口滩岸高地上挖掘珠饰（图 3-25），该高地海拔为 27 m，珠饰出土于距地表 1.5 m 左右的地层中。该遗址所在地区地层关系混乱，有 7~14 世纪佛塔地基遗址叠压其间，由于没有完整的地层揭露，古代珠饰出土的具体地层年代很难厘清。

当地人在遗址上随意掘洞取土，然后在河边用很原始的筛洗方法筛选出其中的珠饰，由于取土的地层位置不明，不同层位的泥土也被混杂，故出土物的地层信息缺失（图 3-26、图 3-27）。笔者在缅甸遗产保护协会工作人员的指引下，目睹了当地人在大约 2 小时内，采用筛洗的方法发现蓝色、绿色的细小玻璃珠 27 粒，黑白相间色玛瑙珠 1 粒，以及大小约 20 mm×30 mm 的蓝色玻璃料块 1 块（图 3-28、图 3-29）。科技分析的结果认为，这些珠饰和料块主要是中等钠铝 (m-Na-Al) 玻璃，与泰国南部、柬埔寨西南部等地铁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玻璃珠饰在类型和成分上都较为一致。<sup>[55]</sup>



图 3-26 当地人盗掘取土回填后留下的坑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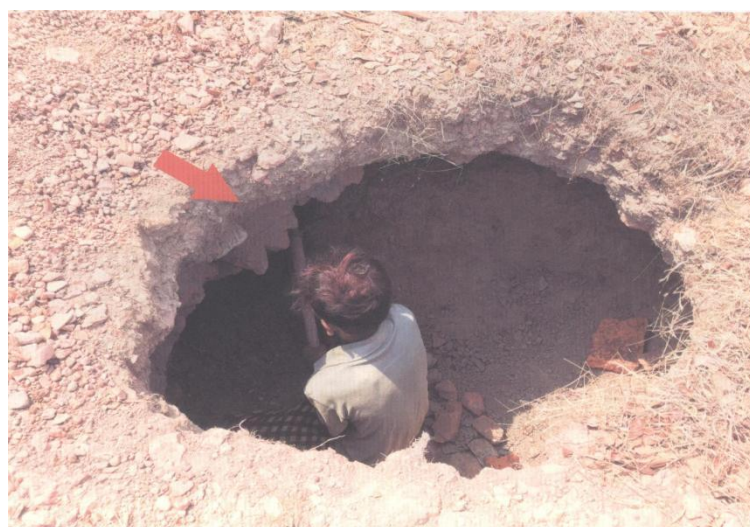


图 3-27 取土的坑洞（红色箭头指示的是 7~14 世纪的佛教建筑砖块堆积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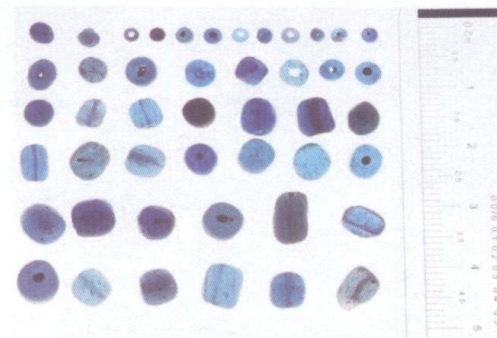
图 3-28 缅甸当地人采用筛洗的方法寻找其中的珠饰  
从图上可以看出，有不少晚期的砖块、陶器等碎片混入其中，珠饰出土的具体地层很难厘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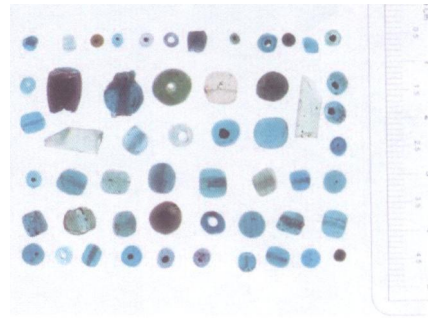
a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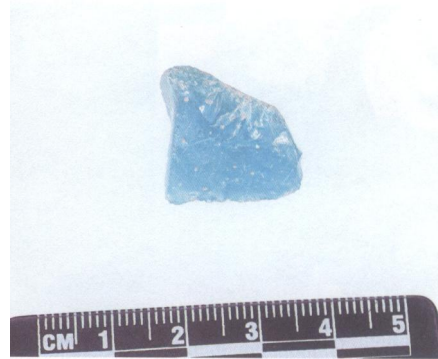
c



d



e



f

图 3-29 采用筛洗的方法发现的细小玻璃珠、玛瑙珠、蓝色玻璃料

a、e、f. 毛淡棉地区出土的淡蓝色玻璃料块，后经初步的科技考古分析证明，其与泰国南部出土物成分类似  
b、c、d. 毛淡棉地区出土的印度-太平洋玻璃珠，相似的珠饰亦广泛见于泰国南部、越南南部和中国华南等地的铁器时代遗址中

根据缅甸遗产保护协会所提供的标本初步研究认为，该遗址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生产制造和技术传播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从笔者所观察到的珠饰来看，不少类似的珠饰和玻璃器亦广泛发现于泰国南部三乔山遗址<sup>[56,57]</sup>和 Khao Sek 遗址<sup>[58]</sup>。这些地区出产的玻璃珠饰都属于典型的“史前晚期南海风格” (Late Prehistoric South China Sea Style) 器物。如图 3-30 所示的截角立方体珠饰，相似风格的珠饰亦见于泰国南部三乔山遗址、Khao Sek 遗址，以及中国广州的东汉墓中。



图 3-30 毛淡棉遗址出土的截角立方体玻璃珠

毛淡棉遗址出土有大量未成形的玻璃碎片、加工完成的玻璃手镯、印度-太平洋玻璃珠等，其中大量蓝色、蓝绿色、亮蓝色的手镯碎片与 Khao Sek 遗址出土标本在外观和形制上惊人的相似。Dussubieux 和 Bellina 将 Khao Sek 遗址出土的玻璃手镯根据横截面的形态分成了 4 种类型，分别是 A 型（半圆形）、B 型（屋顶形）、C 型（三角形）和 D 型（半尖圆形）。毛淡棉遗址所出土的玻璃手镯中 A 型、B 型和 D 型居多，B 型较少见（图 3-31）。<sup>[5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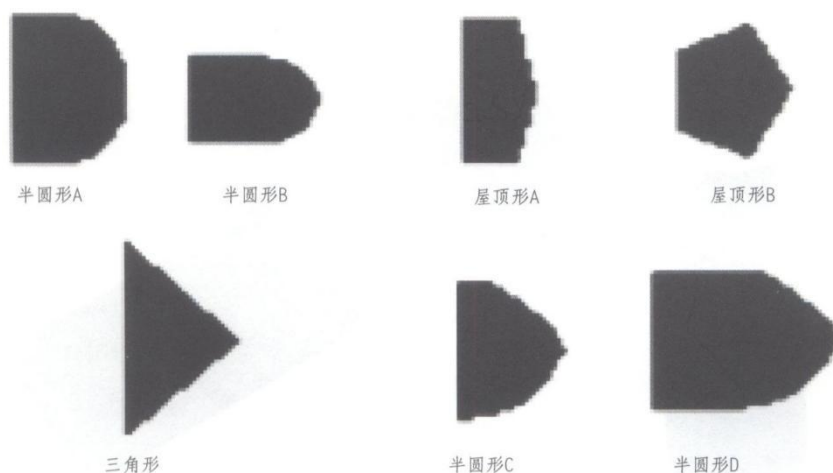


图 3-31 Khao Sek 遗址出土玻璃手镯的类型

毛淡棉遗址出土的这类玻璃原料、碎料数量非常可观。据当地人称，单次出土的玻璃料可达 10 多千克，最大的块体达 15 cm×15 cm。另外，他们还称曾经挖到过玻璃窑炉的遗址，窑炉的底部有大量颜色混杂的熔炼残渣，可惜的是这些遗址和遗存已经被破坏。毛淡棉地区是否具有大规模的玻璃熔炼窑炉遗址，目前暂时无法考证。

但无论如何，鉴于毛淡棉遗址出土的玻璃料块数量巨大，我们大胆地推测此地曾是一个玻璃加工中心。在毛淡棉遗址收集的各种玻璃标本尚有待深入和系统的科技考古分析（图 3-32）。



图 3-32 毛淡棉遗址出土的各种玻璃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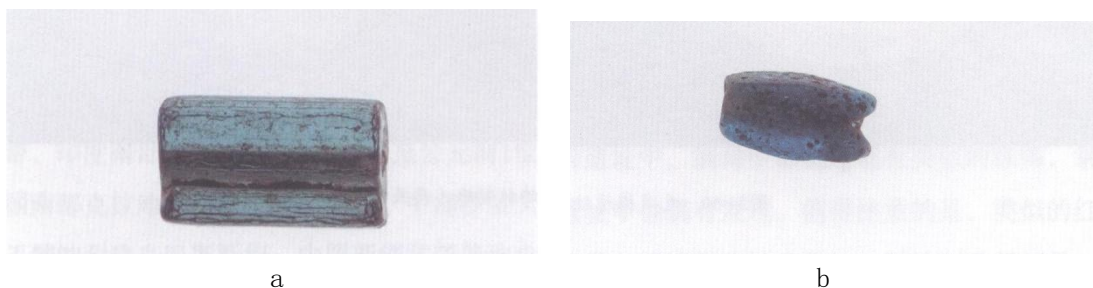
a、b. 淡蓝绿色的玻璃镯残片，边缘有明显的软化弯曲的迹象，可能是加工制作的半成品或者是退火失败的产品  
c~h. 蓝色、蓝绿色玻璃镯碎片，相似的玻璃镯碎片亦大量见于泰国 Khao Sek 遗址

毛淡棉遗址也出土大量拉制或采用宝石加工技术制作的玻璃珠饰，如前文列举的截角立方体玻璃珠即此种范例。长形六棱双锥形、六棱长筒形、四棱长筒形、系领状等形制的玻璃珠饰也很常见。其中，图 3-33 中的长形六棱双锥形玻璃珠广泛发现于印度北部，泰国班东达潘铁器时代遗址<sup>[60]</sup>、南部春蓬府地区<sup>[61]</sup>，以及中国合浦汉墓<sup>[62]</sup>、广州汉墓<sup>[63]</sup>，甚至云南李家山战国晚期遗存<sup>[64]</sup>中。该形制的珠饰制作时间长、分布地域广，显示了文化和技术的传播范围相当广泛，精细的成分类型对比有待于今后深入的科技考古学分析。图

3-34 中的珠饰可能采用了宝石加工技术制作，相似珠饰亦见于泰国南部差那港、甲米府<sup>[65]</sup>等地；图 3-35 中的系领状珠广泛分布于印度次大陆、泰国南部以及中国华南地区<sup>[66]</sup>，而拉制旋纹珠曾发现于泰国甲米府；图 3-36 的拉制珠亦曾发现于泰国南部的甲米府，其中左边的白色拉制圆珠与中国华南番禺小谷围岛港尾港西汉后期汉墓 M4 出土的白色拉制珠 (2003GXBG4:54) 非常类似。毛淡棉遗址虽然出土有大量此类珠饰，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该地曾制作拉制珠和宝石加工技术玻璃珠，这些形制特别的珠饰可能是从别的贸易地交易而来。



图 3-33 长形六棱双锥形玻璃珠



a

b

图 3-34 六棱长筒形(a)、四棱长筒形玻璃珠(b)



a. 系领状珠

b. 拉制旋纹珠

c. 系领状珠

d. 系领状珠

图 3-35 毛淡棉遗址出土的玻璃珠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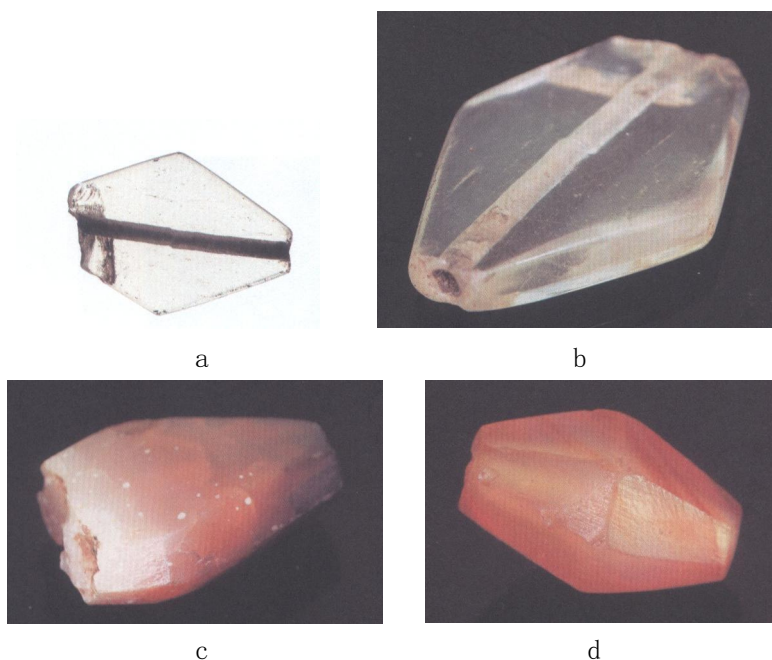
a



b

图 3-36 毛淡棉遗址出土的拉制珠（两头收束，断口粗糙）

与此同时，毛淡棉遗址出土的硬石(hard stone)类珠饰也具有非常典型的贸易特征。该地出产的硬石类珠饰形制非常多元，如红玉髓和水晶质地的扁平六棱双锥珠(图 3-37:a、b、c)以及截角六棱双锥珠(图 3-38:d)广泛发现于泰国南部遗址，越南南部 Dong Nai 文化遗址、沙莹文化遗址，以及中国合浦汉墓、广州汉墓等，是一类典型的贸易珠饰。其中，泰国南部三乔山遗址发现有大量的红玉髓珠饰碎料及半成品，该地被认为是红玉髓等硬石类珠饰加工的主要地区。相对的，毛淡棉遗址缺乏硬石类珠饰加工的半成品和中间阶段产物。



a

b

c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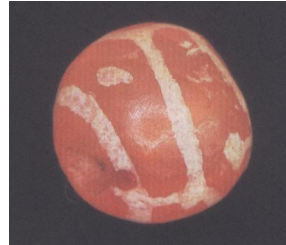
图 3-37 毛淡棉遗址出土的扁平六棱双锥珠饰和截角六棱双锥珠饰

毛淡棉遗址亦出土有绿柱石珠、系领状石榴子石珠、系领状紫水晶珠和红玉髓蚀刻珠等典型的各类宝石珠饰(图 3-38)。其中，相似形制的红玉髓蚀刻珠还发现于孟加拉南部河口地带、印度南部和北部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前 1 世纪的遗址中，缅甸中部也发现有类

似的珠饰，泰国南部克拉地峡地区，越南南部、中部沙莹文化遗址中也偶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红玉髓蚀刻珠在巴斯斯坦、中国新疆北部等地也有发现。毛淡棉遗址此类红玉髓蚀刻珠很罕见，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此类珠饰曾在当地生产。



a. 破损的紫水晶扁系领状珠



b. 蚀刻石髓珠



c. 各种宝石类珠饰

图 3-38 采用宝石加工技术制作的珠饰

系领状的石榴子石珠曾发现于中国合浦汉墓氮肥厂 M1 和第二麻纺厂 M4。<sup>[67]</sup>不同的是，毛淡棉遗址发现的这枚石榴子石质系领珠外观呈扁平状，相似形制的玛瑙质地系领状珠也发现于中国合浦文昌塔生资 M1、越南沙莹文化遗址中。<sup>[68]</sup>中国合浦所出土的石榴子石珠饰经过科技考古分析比较认为，至少其材质和印度南部矿源相符，毛淡棉遗址出土的这枚石榴子石珠饰有待更深入的科技考古研究。

毛淡棉遗址出土有 5 枚细小的透明不规则抛光硬石类珠饰（图 3-38:c），经过拉曼光谱仪分析认定其材质为透绿柱石，相似的珠饰广泛发现于中国华南各地的汉墓中，如合浦黄泥岗 M1、凸鬼岭齿轮厂 M17、北插江盐滩 M1，贵县（今贵港市）铁路新村、水电设备厂 M5<sup>[69]</sup>以及广州先烈路龙生岗 M43、湖南西汉墓<sup>[70]</sup>等地。该类珠饰可能来自印度南部。

综上所述，毛淡棉遗址可能曾是一个玻璃二次加工生产基地，主要用蓝色、蓝绿色半透明玻璃生产、制作手镯，另外可能亦有印度-太平洋玻璃珠生产，但是复杂的拉制玻璃珠和宝石加工技术制作的玻璃珠，以及硬石类珠饰并不在此地生产，大量的多来源、多形制的小型珠饰出土暗示了毛淡棉曾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充当中转站、交易中心的角色。

### (九) 缅甸南部高登(Kawthaung)遗址

高登位于缅甸陆地领土的最南端，与泰国拉廊(Rarong)府隔海相望，处于克拉地峡的西岸。笔者于2018年3月在缅甸遗产保护协会负责人 Terence Tan 的带领下，前往该地进行考察（图 3-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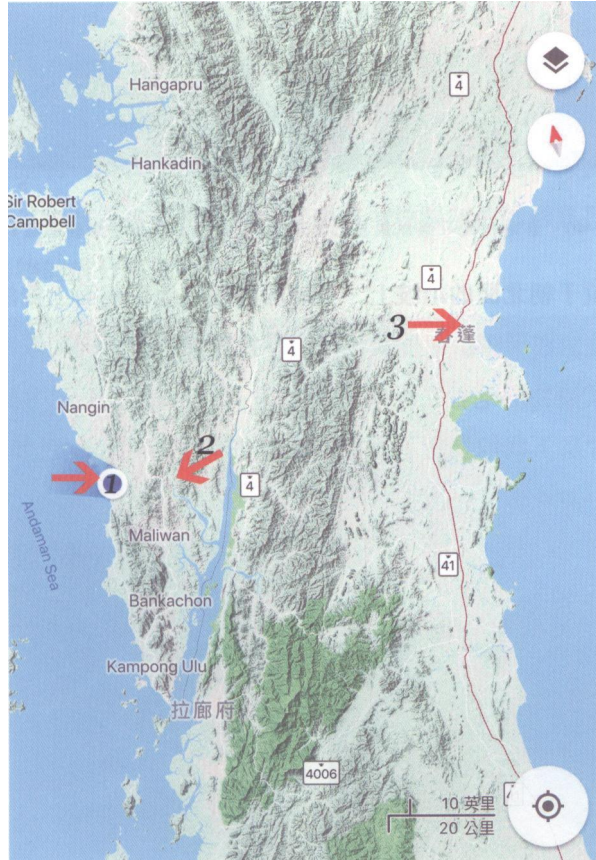


图 3-39 高登遗址分布

点位 1 位于 Nandin 附近的遗址；点位 2 位于 Kahawgyi 附近的遗址；点位 3 位于泰国三乔山遗划

当地一些居民称，2008 年发生的安达曼大海啸直接侵袭了缅甸西部海岸，高登地区西侧的沿岸遭受严重破坏，在重建过程中，他们在高登市区西北约 35 km 的海湾滩岸中发现有散落的古代珠饰。泰国古代珠饰学者班查·彭帕宁在撰写《Beyond beads》一书时，已经注意到高登市附近的“登登”和“崖湾”两个地方有古代珠饰出土<sup>[71]</sup>，所以当地发现古代珠饰的时间应该早于 2008 年。

Nandin 是当地靠海的渔村，村民大多有佩戴古代珠饰的习惯，根据村民叙述，这些珠饰都是发现于渔村周边的土丘上（图 3-40）。笔者考察的其中一个遗址坐落在距离 Nandin 村南面约 2 km 的红树林后的土丘上，土丘海拔 10~25 m，距离现在的海岸线约 1 km。





图 3-40 当地村民习惯佩戴自己发现的珠饰(a)及位于红树林后的土坡(b)

珠饰出土地主要位于朝北面的山坡上，当地居民随机地在地面上掘洞探查，如果有零星的珠饰出土，则有目的地在周围扩大搜索范围，寻找珠饰。为了提高效率，他们甚至修建了简易的筛洗设备淘洗古代遗物。笔者在距离地表仅 20~50 cm 的沙土层中找到大量红色粗陶片和灰黑色细陶片，在陶片层下我们发现了直径 1 mm 左右的淡绿色、蓝色和黄色的印度-太平洋玻璃珠。(图 3-41、图 3-42)



图 3-41 当地村民用于淘洗珠饰的简易工具及遗物出土点 (A、C点发现陶器，B点发现玻璃珠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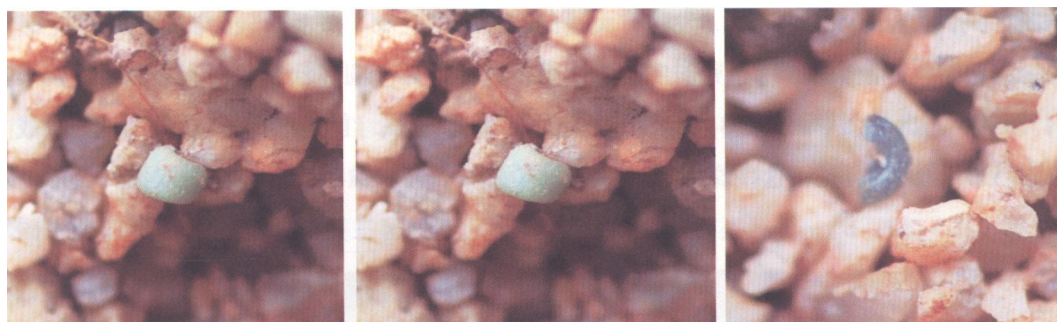


图 3-42 沙土层中保存的玻璃珠饰

Nandin 村村民家中收藏有数量可观的珠饰制作半成品，其中包括拉制玻璃珠、马赛克玻璃珠，以及铸造后采用宝石加工工艺制作的多面体玻璃珠等（图 3-43:a）；当地亦发现有大量的蓝色、蓝绿色、红色玻璃料块，以及留有热加工工具痕迹的玻璃废料（图 3-43:b）、残破的玻璃手镯，还有可能由于退火温度过高而塌陷熔聚的印度-太平洋玻璃珠碎块，甚至还有坩锅熔炼废料等次级甚至是初级玻璃加工证据（图 3-44）。在缅甸遗产保护协会的协助下，当地出土的部分玻璃样品经过科技考古分析发现，其中有一块深蓝色圆形具孔玻璃饼碎片的成分与中国合浦所出土相似器物的成分高度吻合。



a. 玻璃珠饰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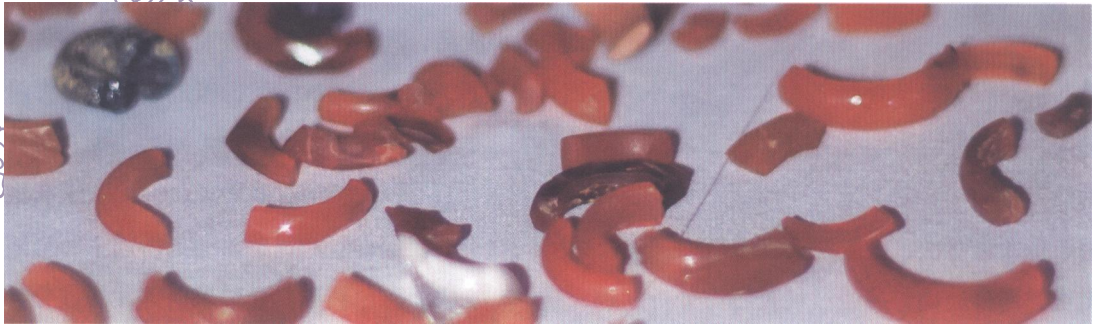
b. 玻璃废料

图 3-43 宝石加工工艺制作的玻璃珠饰残片和留有热加工工具痕迹的玻璃废料



图 3-44 当地村民收集的玻璃料块和玻璃手镯碎片

除了各种玻璃制品，该地亦发现有大量的石质珠成品和半成品，较为典型的有红玉髓质地的指环碎片，相似的器物亦见于广西汉墓中，这种指环呈圆环状，截面为半圆形或尖半圆形，顶部切割出一个平面（图 3-45:a）。此外，缟纹玛瑙、红玉髓、石英质地的珠饰半成品或成品残片也大量可见，这些珠饰形制多样，有圆球形、双锥长管形、截尖双锥六棱形、扁片状等（图 3-45:b、c），类似形制的珠饰广泛见于泰国三乔山遗址、越南南部和中国华南广大地区。这些珠饰抛光打磨精细、打孔细小，应该归类于铁器时代早期珠饰加工工艺的产品。<sup>[72]</sup>



a



b



c

图 3-45 Nandin 村遗址出土的珠饰加工半成品

值得注意的是，该地亦发现有黑底白线的蚀刻玉髓珠（图 3-46），这些玉髓珠质地细腻，蚀刻均匀，从外观上明显不是多见于缅甸中部地区以木化石制作的蚀刻珠。类似的质地良好的蚀刻珠广泛发现于印度北部、孟加拉西北部、泰国三乔山、越南南部沙莹文化遗址<sup>[73]</sup>以及中国华南等地，其中一种足球形外观的黑色蚀刻圆珠亦发现于缅甸中部萨蒙河谷遗址和中国广西贵港汉墓<sup>[74]</sup>中。



图 3-46 Nandin 村遗址出土的黑色蚀刻玉髓珠饰

此外，笔者还发现一件未完全抛光的玛瑙质碗半成品残片。该残片以灰、褐色条纹玛瑙制成，残留部分为碗底足部和腹部，相似的玛瑙质地碗或盘等器物多见于今埃及、伊朗等地，而中国汉代墓葬中相似的器物较为罕见（图 3-47）。



图 3-47 玛瑙质碗的残片

Kahawngyi 遗址位于高登市区北侧，古代珠饰出土地位于一片海拔约 140 m 的山谷朝向东面的山坡上。该地位于名 Glohng Kamou Duen River（图 3-48）的一条小溪源头处，该河向东南方向汇入克拉河中，遗址附近河面宽约 90 m，应该具备航船的通行能力。



图 3-48 Glohng Kamou Duen River（蓝色箭头代表水流方向）

当地村民称，在大雨过后偶尔会在山坡上捡到古代珠饰。为了获取更多的珠饰，村民在小溪中架设了简易的淘洗设备，从山坡上掘土冲洗。据村民叙述，珠饰通常发现于距地表不深的土层中（图 3-49），最深处仅 1 m 左右，再往下挖就是花岗岩的基岩，由于没有系统的考古发掘，珠饰具体出产地层已被打乱。



图 3-49 当地村民收集的各种硬石珠饰制作原料、碎块和半成品

该地出土的古代珠饰品种多样，玻璃珠有大量的印度-太平洋贸易珠、采用宝石加工技术制作的玻璃珠、拉制珠等；硬石类珠饰有水晶和玉髓质地的截尖双锥六棱形珠、绿柱石珠、红玉髓圆珠、双锥长筒形红玉髓珠、具有复杂纹饰的蚀刻红玉髓珠，同时出土大量硬石、玻璃碎料和加工磨石等（图 3-50）。



a. 储存在陶罐中的蓝色玻璃料块

b. 可能用于抛光圆形珠饰的磨石

图 3-50 出土的玻璃碎料和加工磨石

总的来说，高登几个遗址出土的古代珠饰普遍质量上乘，加工精细，而遗址出土有大量的原材料碎块、加工半成品和残破珠饰，珠饰来源复杂，既可能有在本地加工的产品，又可能有来自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品。另外，Nandin 村遗址与 Kahawgyi 遗址所出土珠饰类别基本相似，甚至与泰国三乔山、拉廊府甲武里等遗址所出珠饰组合高度吻合。

虽然目前该地尚未经过系统的考古发掘，相应的考古地层年代尚不明确，但是笔者认为此地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古代珠饰加工基地，并且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口岸。有趣的是，Nandin 村遗址与 Kahawgyi 遗址之间虽然有一条海拔超过 150 m、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阻隔，但是 Kahawgyi 镇西北角有一座海拔仅 45 m 的山坳，这两地之间似乎存在

一条长 13 km 左右的平缓道路，其间甚至有小溪流沟通，故不论是就该片区域所出的珠饰类别，还是今后可能开展的考古发掘，这一区域都应当合并探讨。